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孟子仁政理想的理论关联^{〔*〕}

○ 戴兆国

(安徽师范大学 政治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着多重理论向度。对这一理论的弘扬可以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获取积极的智性资源。孟子仁政理想的展开依托于恒产恒心论、规矩方圆论、谨庠序之教三个主要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面向。分析二者之间的理论关联有助于加深和拓展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解。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仁政理想; 理论关联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0.00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对人类文明发展方式积极思考的成果。这一理论蕴含着多重理论向度,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追求大同社会理想的继承,也有对共产主义追求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思想的推进,还有对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未来反思。分析地看,孟子倡导的仁政理想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资源,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多重指向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存在着多重关联。孟子仁政理想的展开依托于恒产恒心论、规矩方圆论、谨庠序之教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分别对应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三重面向,体现了两者理论之间的密切关联。恒产恒心论揭示了仁政理想的物质生活基础,这是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前提。规矩方圆论阐述了政治生活治理的规范之道,这是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保证。谨庠序之教指出了文化生活之于实现社会理想的关键作

作者简介:戴兆国(1971—),安徽师范大学政治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西哲学比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本文系安徽省 2016 年社科规划项目(AHSKY2016D125)的阶段性成果。

用,这是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根本途径。

一、恒产恒心论与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关联

“仁政”一词在《孟子》中共出现十次,均在前四篇。《梁惠王》《滕文公》各三次,《公孙丑》《离娄》各两次。其中有八次是以“施行仁政”来予以表述的。孟子在与诸侯国君的讨论中,反复阐述自己的仁政主张,对仁政理想做出了详细的设计。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我们可以把孟子提出的“五亩之宅”的理想社会称之为“仁政理想国”,这是孟子仁政理论的终极旨归。对这一理想的描述还出现在与齐宣王的对话中,即《梁惠王上》第七章,也是孟子学研究中较为著名的“齐桓晋文之事”章。从《孟子》本文来看,在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对话中,都表达了这一仁政理想,应当说不是偶然的。这反映出孟子对自己仁政理想主张的重视。孟子希望通过影响像梁惠王、齐宣王这些重要的诸侯国君来实现自己的仁政抱负。“五亩之宅”的理想在今天看来,似乎显得很容易实现。但是对于身处农业时代的人来说却非易事。农业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自然灾害频繁,社会动荡不安。在这样的局面中,人们盼望得到稳定的居所,耕田种地,植麻树桑,温饱的生活能够持续。到了年老体衰之时,饮食依然比较丰富。常年还有充足的田地供数口之家耕种,以避免饥饿之苦。在《孟子》对仁政理想的细节设计中,我们不难看出,摆脱物质资料短缺的困扰,是人们追求基本经济生活保障的底线。孟子提出的恒产恒心论,就是解决如何确保人们物质生活的稳定问题,实现饱食暖衣,达成“五亩之宅”的理想。

恒产恒心论在《孟子》中两见,即“齐桓晋文之事”章和“滕文公问为国”章,由此也可见此论的重要性。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之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中的核心概念就是恒产和恒心。赵岐注:“恒,常也。产,生也。恒产,则民常可以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1〕}这就是说,恒产是百姓维持日常生存的基本产业。恒心则是人们平常所拥有的良善之心。综合分析这段

话,至少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无恒产而有恒心的人,但是这种情况仅仅限于少数士人。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士属于古代的贵族阶层,同时也属于当时的知识阶层。余英时指出,孟子认为只有士可以摆脱个人经济基础的限定而发展他的恒心。由于知识阶层不属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经济阶级,因此它能够坚守其思想上的信念,这种思想上的信念就是对孟子所谓恒心的现代诠释。^[2]二是对于普通人来说,无恒产就无恒心。因为没有恒心,普通人就会堕入放辟邪侈的地步。三是仁政的治理就是要制民之产,使广大的民众有富足的产业,生活温饱而稳定,由此社会的礼义规范也就容易得到施行。概括地说,恒产恒心论就是强调基本的物质生活保证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对此,王夫之有过很好的总结,他说:“苟无恒产,以无恒心,以至于恣所欲而放,因成乎偏僻之恶;行其私而邪,因成乎穷极之蹙。……所谓恒产也,可久而不易者也。……唯其产之无恒,是以心之无恒也。民者,国之本也,产者,心之本也。”^[3]王夫之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产业是民心的根本。国家的发展离不开民众,民心的稳定离不开恒定的产业。国家的治理如果不能满足百姓对物质生活的基本需要,就会罔陷百姓于死亡之地,于此也就谈不上礼义制度的设立和施行。“明君知此,当先遂其生,使之养生丧死无憾;次富之,使仓廩实而知礼节;继教之,则反本而知仁。”^[4]这就是说,明君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要让普通民众保有恒定的产业,生活能够延续。在此基础上,民众再获得财富的增长,进而追求文明的生活方式。由于财富充足,人们就有更多的能力去重视教育。国家发展教育的目的,就是不断培养人们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最终使人们回归仁义的根本,认识到仁义的价值。

恒产恒心论强调任何社会的存在与发展都需要物质前提。只有在一定物质基础上,民有恒心才成为可能。马克思在阐述唯物史观时,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他指出人类历史活动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这是人类维持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5]面对全球化发展的历史事实,唯物史观揭示的这一基本原理并没有过时。相反,我们需要在更加广阔的视野中看待和解决人类发展的物质前提这一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呼应了全球化时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如何完善人类物质生活这一话题。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历史潮流,人类物质生活的交往已经不再处于封闭的状态。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都不可能是封闭的,其经济发展都离不开周边乃至全球性的现实生产状况。在全球性的物质交往条件下,人类要想满足整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就必须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发展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物质生活。无论从某个国家或地区,还是从全球范围来看,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一切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这些基本诉求与恒产恒心论的要求是一致的。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就是要打造经济命运共同体,这是在全球化时代实现不同国家对共同利益追求的根本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就是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为

此,可以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方面,推进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从而提高世界经济发展水平。^[6]道路联通、贸易相通、货币流通代表的是经济交往的联通,这是产业的相通。只有产业相通,民心才能够相通。只有民心相通才有可能让融入经济带建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感受到命运共同体的存在。因此,只要承认共同利益存在,就要认可经济命运共同体存在,由此就需要接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

为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提出筹建亚投行。这是为世界经济同步发展实施的有力举措。2016年1月,习近平在亚投行开业仪式的讲话中,指出亚投行的开业,顺应了世界经济格局调整演变的趋势,有助于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中国愿意同各方一道,推动亚投行早日投入运营、发挥作用,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贡献力量。习近平提出,我们将继续欢迎包括亚投行在内的新老国际金融机构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7]“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通过振兴世界经济,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真正实现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不可能靠一两个国家来完成,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参与。在世界经济发展还不平衡的时代,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贯彻新时期的恒产恒心论。孟子强调的恒产是将持续的物质生产和供给看作是社会治理的基本条件。在孟子那里,保证民有恒产而有恒心是仁政施行的现实根基。普通人因为有了常生的产业,也就能够具备常有的善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如果失去基本的善心,民的行为就会无从控制。相反,如果能够保证民有恒产恒心,仁政就可以得到施行。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以经济命运共同体为基础,这就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合作和协调。2017年5月,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大家积极评价“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取得的进展,认为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对于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强各国内生发展动力、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我们愿继续努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更大进展,让各国政策沟通更有力,设施联通更高效,贸易更畅通,资金更融通,民心更相通。^[8]可以看出,“一带一路”建设所坚持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五位一体的。其基本指向是建设经济命运共同体。在世界经济发展仍然存在局部落后,整体不平衡的时代,倡导以恒产引导恒心,追求经济发展命运的共通,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基础性的。根据笔者的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向不是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经济发展要本着人类的真实需要,建立恒产的制度,使所有人都能够在保证温饱的基础上,自觉参与社会劳动,保有一份为社会贡献的恒心。在这个意义上,恒产恒心论指示了一条人类经济恒久发展的道路。

从地理大发现,到新航路的开辟,人类历史已经走过了五个多世纪。在这五百多年的历史演进中,西方强国次第崛起。然而,欧洲列强所到之处,并没有给世界带来更多的繁荣和富强,而是到处燃起战火和硝烟。许多长期独立生存的

优秀民族在列强的刀与火中倒下了,有些甚至彻底消逝了。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悲剧。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经过自身的努力和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自身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中国并没有忘记世界范围内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提出,以及推动实现这一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就是向世界表明,中国在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同样希望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保有长久的动力,进而不断改善世界范围内所有人的物质生活状况。孟子的仁政理想也以和平为最高价值引领。仁政理论依托的恒产恒心论,就是追求实现普通民众的物质生活。推而广之,在世界范围内,经济命运共同体就是要保障恒产恒心的落实,进而使得世界经济的永续发展成为可能。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提出,只要国家实行仁政的治理,天下人都愿意来此服务,耕种者都愿意来此耕种,商贾也都愿意来此贸易,行旅之人都愿意来此走动,那些对自己国家政策不满意的人,都愿意来此生活。在此种情势下,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自然不在话下。这样的国家,谁还能够阻挡他施行仁政呢?孟子描绘的仁政蓝图,满含着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切。在这个意义上,仁政理想依托的恒产恒心这一理论维度与人类经济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理论上是相关联的。

二、规矩方圆论与政治命运共同体

仁政治理不仅要以恒产恒心做基本的物质保障,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还需要依靠一系列的制度予以保障。这就是孟子提出的规矩方圆论。

孟子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

这段话集中阐述了孟子的规矩方圆论。这一理论强调仁政之道就是尧舜之道,是规矩方圆之道,是德法并用之道。规矩本指工匠制作使用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确定规整的方圆,就像六律调正五音。尧舜治理天下也是如此。尧舜并不是仅仅依靠自己的仁心来治理天下,而是将仁心与仁政结合在一起。二者结合体现的是社会政治治理的基本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向往仁政、懂得以

仁政治理国家的人才适合治理国家。相反,那些反对仁政的人,如果治理国家,则只会败坏社会治理,传播消极的观念给大家。这是国家和社会治理最为危险的事情。不能施行仁政的人一旦掌握了国家治理的权力,其危害就非常之大。历史上所出现过的暴虐的君主,其统治没有一个会顺应民心,安定天下,最后都只会走向败亡,成为历史的明鉴。

根据规矩方圆论的要求,仁政的社会治理就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徒善不足以为政,盖谓虽有先王之道而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盖谓虽有规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规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后能成其方员、正其五音也。尧舜之道,自不足以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后能平治天下而为法于后世也。”^[9]这一解释抓住了《孟子》上下文相贯通的义理,指出规矩方圆之治离不开崇尚仁政治理的人。正如孟子强调的那样,先王之道就是仁政之道,以不忍人之政覆天下。在上者不遵守规矩,在下者不循从法律,朝廷的官员不相信道义,工匠不相信尺度,君子触犯义礼,普通人罹于刑法,这样的国家是很难存在下去的。由此可见,德(徒善)与法(徒法)的完美结合才是仁政的治理方策。孟子专门就子产治国的做法进行了评判。“子产听郑国之政,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孟子·离娄上》)对此,孟子认为这是“惠而不知为政。”子产作为大夫,用自己的车子帮助人们过河,这种做法看上去爱民、助民、亲民。但在孟子看来却不是真正的治理之道。为政者不可能事事亲为,更不能为了取悦于民,而是要立足于完善的制度实现自己的政治承诺,这是为政的目的。

其实,在孟子提出的规矩方圆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强调的核心所在,那就是仁政即善政,善政即德政。按照通常的理解,很多人总是认为仁政强调对治理者德性有很高的要求,只有德性高尚的人才有资格治理国家。但是德性高尚的人未必有很强的治理能力,由此就有可能导向简单的人治。这样一来,那种强调以纯粹的法治规则去治理国家的做法就难以得到落实。这种看法简单地将仁政归结为人治。因为人治带有人的主观性,普遍客观的法治规则就难以落实,就无法实现法治,最终就把人治与法治对立起来。其实从孔子开始,或者说从更早先的周代礼治传统开始,仁政就不单纯是一种人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从孟子阐述的仁政论来看,其所蕴含的治理模式更多是融合德与法的仁政论。我们不能简单将之归为人治或法治。分析地看,德治是运用道德的规则约束人的行为,具有劝导性。法治则是运用法律的规则约束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孟子的仁政理想一定程度上是二者的有机结合。何怀宏认为儒家的治理思想,是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治理模式的基础。“自西汉中期以后,主导的政治思想不再是一味加强君主集权的法家思想,而是强调生命价值、以民为本和统治者德行的儒家思想。”^[10]钱穆也指出,中国文化在汉唐时代,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已经得到实现。为理想文化的安放提供了共通的架构。^[11]这些观点的理论指向与仁政论密切相关。

儒家将盛德作为衡量仁政治理的最高标准。“圣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谷不灾，诸侯无兵而正，小民无刑而治，蛮夷怀服。古者天子常以季冬考德，以观治乱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乱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考德，而天下之治乱得失，可坐庙堂之上而知也。德盛则修法，德不盛则饰政，法政而德不衰，故曰王也。”^[12]德盛则治，则天下安，德不盛则乱，则天下失。儒家提出圣王的治理，要达到人民生活幸福安定，牲畜蓄养兴旺繁盛，五谷生长没有灾害，诸侯之间不用征战，普通人循从国家治理无需动用刑法，蛮夷之邦满怀悦纳服从之心。国家在每年确定的时间里考察道德风气的实际状况，以此来判断治理的得失。可以说，君子考德是仁政治理的重要措施，反映了仁政治理的德性价值指向。

仁政治理并非排除刑政。但在儒家那里，任何刑名法术都要以盛德为标准。“无德法而专以刑法御民，民心走，国必亡。亡德法，民心无所法循，迷惑失道，上必以为乱无道；苟以为乱无道，刑罚必不克，成其无道，上下俱无道。”^[13]法者当为有德之法，法无德，则法而无法。缺少德性的法律不是良法。只是强调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国家，其结果必然是民心走，国家亡。德法强调法则规范要有仁德的精神，这就要求立法者首先就要做到有德，秉持宽和的精神。“适中宽和的精神应当是立法者的精神；政治的‘善’就好像道德的‘善’一样，是经常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14]在儒家那里，政治的、道德的，乃至社会生活领域中，各种“善”都统一于最高的“善”。这个“善”可以是“仁”，也可以是“德”，也可以是“道”。

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要有坚实的政治互信，这是共同体建设的政治保证。在民族国家分立的时代，提倡建设命运共同体离不开国际社会交往运行的合理规则。所有交往规则的制定必须本着规矩方圆之道，其中最大的规矩就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政府早在1953年就曾提出的国际社会交往规则。其具体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半个多世纪以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同和接受。如果对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做进一步概括，我们可以将之归结为主权、非攻、独立、平等、和平五大原则。这五大原则蕴含的内在精神与仁政治理的理想非常一致，其具体的原则规范，已经成为现时代处理国家关系的世界性的规矩方圆之道。主权是国家的尊严所在，国无论大小，都享有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攻不仅旨在避免战争，更在于消除战争。国家之间能够做到互不侵犯，人民之间的友好相处就有了基础。每个国家独立处理自己的国内事务，其他国家不应该对别国内政指手画脚。国与国之间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互惠互利。这四项原则是国家间交往的底线原则。只有这四项原则能够得到遵守，最后的和平原则才有可能得到实现。五项基本原则中，和平原则是最高价值引领。如果将孟子的规矩方圆论与仁政理想的实现结合在一起，我们也可以说，和平共处这一规矩既是实现仁政理想的最高价值引领，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高价值引领。

为此,习近平指出,中国始终是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同印度、缅甸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益成为指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1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有共同的政治根基,维护这一根基就必须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规矩方圆之道。“迈向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各国体量有大小、国力有强弱、发展有先后,但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都有平等参与地区和国际事务的权利。涉及大家的事情要由各国共同商量来办。”^[16]不同国家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对待,就必须树立起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

如果说建设经济命运共同体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物质层面奠定经济基础,那么建设政治命运共同体则是从制度层面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政治保证。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的是解决国家间交往出现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又不可能依靠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来解决。在国际社会交往越来越密切的今天,许多社会问题,如恐怖袭击、难民危机、消除贫困、大气治理、太空开发等,都需要很多国家甚至所有国家携手合作,共同面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国际政治治理体系的建设显然属于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题中之义。国际政治治理就是要维护良好的国际政治秩序,确立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意识必然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蕴含的规矩方圆之道,以和平原则为最高价值引领,能够为国际政治治理提供有益的智性资源。那种借口制度差异,奉行单边主义,固守所谓的国家利益至上,以邻为壑,远离和平共处交往规则的做法显然无法解决国际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这一点,在孟子的仁政理论体系中也有明确的阐发。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于禹。”孟子曰:“子过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水逆行谓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恶也。吾子过矣。”(《孟子·告子下》)

赵岐注:“子之所言过矣,禹除中国之害,以四海为沟壑,以受其害水,故后世赖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邻国,触于洚水之名,仁人恶为之。自以为愈于禹,是子亦甚过矣。”^[17]《孟子正义》曰:“非水之道,则水不顺行而逆行矣。逆之为洚,犹逆之为逢,见其逆行,触类而长之,即是禹时之洪水。禹治洪水,使不为后世害。圭放洪水,使为邻国害,圭且为仁人所恶矣。悖乎禹,岂愈于禹与?”^[18]这些解释都是强调,大禹治水,以四海为沟壑,将泛滥的洪水引向大海,这是把握了治水之道。但是白圭的治水方法却不顾及邻国,将自己国家的大水引向邻国。这种治水的方法看上去似乎对自己国家有利,但所犯下的错误已经非常大了。白圭这样的主张不仅不符合仁政的要求,而且还会被仁德的人所抛弃。大禹之治洪水与白圭之放洪水,其间的最大差别就是仁与不仁。

孟子提倡仁政,不仅是对治国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国与国相交的要求。在孟子看来,治国若治水。仁政者国相亲善,以四海为壑。劣政者国相疏恶,以四邻为壑。仁政之道可以久长,劣政之道则难以持续。与之相应,习近平在第七十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9]在此，和平被看作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首要价值。世界只有处在和平的状态中，才能够发展，才能够实现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价值理想。习近平提出的以和平为基础的六大人类共同价值，进一步明确了人类政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规矩方圆之道。

因为追求和平，一切危害、不利于人的生存的做法都应该被摒弃。建设政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世界上所有人获得稳定富足的生活。任何形式的战争，只要违背人类共同命运，有损于人类福祉的获得，我们都需要抵制。这一点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中也得到了强调。

孟子曰：“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在此，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仁道思想。孟子提出不以仁政的方式取得财富，都是对孔子之道的背离。相应于此，那些试图通过战争来获得财富和土地的人，更是不可能施行仁政的治理。以往的战争，要么争夺土地，要么抢占城池，一定都会有大量的人员伤亡。孟子提出善于靠战争让自己不断强大起来的人，罪责是最重的；希望通过合纵连横使自己强大的人，罪责相对其次；只知道开荒垦种使自己强大的人，罪责又其次。对此，赵岐解释说：“孟子言天道重生，战者杀人，故使善战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连诸侯，合纵者也，罪次善战者。辟草任土，不务修德而富国者，罪次合纵连横之人也。”^[20]任何形式的战争都有悖于和平，都是对人类自身的损害。孟子提出的善战者服上刑，对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有着极其重要的警示意义。那些试图通过穷兵黩武，以战争的方式推行自己的政治治理模式的国家，都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道的背离。

三、谨庠序之教与文化命运共同体

前文已经提及《孟子·梁惠王上》第三章对仁政理想国的描述，其中孟子明确提出“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这一主张在孟子与滕文公的对话中，又一次提及并被具体化。

滕文公问为国。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

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在回答滕文公为国之道的过程中,提出要落实恒产恒心就必须“取于民有制”,这是从社会制度的安排上来保障恒产恒心的实现。在孟子看来,制度要靠人来贯彻。人的素质如果得到全面提升,那么制度落实就有可能得到保障,人的素质如果低下,即使好的制度也难以得到执行。培育素质全面的人离不开学校教育。孟子认为谨庠序之教的目的就是明人伦。三代时期的国家治理都非常注重学校教育,教育的主要目的则是让人们对人伦规范都有明确的了解和把握。通过不断的教化,使得社会上各种等级的人都能够循从人伦规范的要求,形成人人相互亲近的社会风气。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愿意施行王道的人,必然都愿意来学习这样的仁政。为此,孟子引用文王治理天下的历史事实予以说明。孟子劝诫滕文公,只要他能够做到人伦明于上,则小民亲于下。这是王道政治取法之所在。

“王者治天下之大法,井田、学校,二者其大端也。周衰道废,税亩与阡陌开,地力尽而井田坏。大学之教不行,师儒之传各异,异端之说争鸣而学校坏。于是而民无恒产,亦无恒心。孟子所欲行王道于天下者,但以此为汲汲。”^[21]井田和教化是孟子追求建立仁政理想国的最为主要的措施。故此,王夫之认为,井田制度被破坏,社会的经济基础就被动摇,教化难以实行,学校教育混乱,人就会丧失恒心。实现王道仁政,孟子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两点。从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井田制是无从恢复的。但是教化人心,使人们具备良好的素质,将永远是孟子仁政理想的最高指向。如果说经济发展是基础,政治制度构建是保障,文化教育发展则是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提倡谨庠序之教代表了国家治理的文明指向。国家治理要能够推进人的自我实现,帮助所有人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这里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就相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达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既要实现经济和政治生活的自由,更要实现精神生活的自由。要实现精神生活的自由,文化教育不可缺少。如果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直接指向的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发展的未来命运,那么其间接的指向则是文化生活的未来命运。从这个角度说,建设文化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最高目标。

经济建设的互联互通,政治交往的和平共处,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奠定了经济和政治基础。文化交往和民心相通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旨归。文化相润,民心相通,是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也可以说是文化命运共同体所必然达成的要求。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以促进民心相通为宗旨。‘民齐者强。’上海合作组织的未来,最终掌握在本组织各国人民手中。我们要支持商界、学界、媒体、智库、文艺团体等各行各业,全方位开展友好交往和人文交流,增进各

国人民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筑牢本组织发展的社会民意基础。”^[23]这就说明任何国家间建立的共同体,都要以民心相通、民意相共为目标。“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荀子·议兵》)荀子认为人民团结一致,就能够促使国家强大,相反,国家就会衰弱。荀子不仅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而且还认为人民必须团结一致,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习近平认为上合组织作用的发挥,并不能依靠几个国家的政府组织来实现,而要依靠这些国家的人们团结一致来实现。如何团结不同国家的人民,就需要广泛开展文化交流活动。这里提及的民意基础,就是人心的相通,就是文化之间的交流。达到这一目的,教化作用不可缺少。

经济的互联互通停留于显性的物质层面,和平共处为不同国家间交往提供了底线遵守。如果说这两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硬实力”,那么文化和民心的相通则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精神层面走向共同命运,提供了最强的“软实力”。为了夯实这些“软实力”,各个国家必须在实质上支持国家间的文化交流合作。在2014年上合组织会议上,习近平代表中方提出,中方支持各国在公共政策、政府管理等方面交流经验,愿意在三年时间里,为本组织成员国提供2000名官员、管理、技术人才培养名额,未来5年内每年邀请50名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年领导人来华研修。中方将依托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协助成员国培训司法人才。这些具体措施就是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做出的努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在2015年的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习近平代表中国,再次提出中国未来5年内将向亚非发展中国家提供10万名培训名额;连续在华举办亚非青年联欢节,共邀请2000名亚非青年来华访问并参加联欢;将成立中国—亚非合作中心,进一步推进亚非各国交流合作。^[24]这些交流措施的实行对于增加亚非国家间民心相通,人心相向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2017年5月15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再次强调:“我们愿探讨多层次、宽领域的人文合作,加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旅游、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搭建更多合作平台,开辟更多合作渠道。我们愿积极创造条件,让社会各阶层、各群体都参与到合作中来,营造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25]人文交流的基础是教育,是文化,每个国家都要把发展教育文化事业放在首位,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只有这样,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深厚的文化根基,文化命运共同体才能够得以建立。

建设文化命运共同体要注意两种不利的倾向。一是在文化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忽视文化领域中实际存在的各种交锋。一些人往往打着国际主义的旗号,宣传推广普世价值,实行所谓的颜色革命。对于这些做法,我们必须保持警惕。我们在开展国家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保持初心,真切地为全世界最普通的劳苦大众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二是在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片面夸大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忽视了文化交流发展的多元性。每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实现

人类文化命运共同体,并不是将某一民族的文化当做至高无上的,而是要允许多种文化并存共荣。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为世界文化增添各种丰富的内容。在传统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的当下,一些人祭起了文化沙文主义的旗帜,一味地宣扬中华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这些人忘记了,任何优秀的民族文化都是在多元交流、碰撞相激中不断走向新的境界这一历史事实。

孟子在与滕文公的对话中,曾经引用《诗经》中的名言:“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并以此劝谏滕文公实行仁政,谨庠序之教,以新其国。在孟子的仁政理想中,谨庠序之教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将发展文化、实施教化作为推进国家治理的主要途径,显示了其仁政思想的开放性。世界各国在发展革新的过程中,如果能够将谨庠序之教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进而积极开展国家间的文化交流,未来的文化命运共同体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习近平提出的多元互动、百花齐放的人文交流局面也一定能够实现。

四、结 语

作为东方世界的古老大国,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遭遇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革面前,并没有失掉自己的根本。相反在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刺激下,正在为世界贡献着自己独特的财富和智慧。钱穆先生曾经对中国文化和平性发展的特性做出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因为一直依赖农业生活,因此气候、雨泽、土壤等构成了无法以人力来安排的具体环境。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形成了对自然的信任与忍耐,没有战胜与克服的心态。天人感应、物我一体、顺与和等农耕文化的特点显露无遗。由此造成中国人安分而守己,最终以和平的面目出现在世界面前。^[26]钱穆进而认为,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传统蕴含着崇高的德性和文化内涵,这造就了中国民族禀有坚强的持续性,同时又具有伟大的同化力。^[27]正是这种民族发展的持续性和同化力,才使得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在 21 世纪焕发出新的光彩。自从孟子系统提出仁政的社会理想,历代儒家学者一直持续地追求实现这一理想。这种对人类命运的内在忧虑和关切,在面临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机遇面前,便衍生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呼应。仁政提倡的恒产恒心论、规矩方圆论、谨庠序之教的理念,激发了人类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共创共同命运的现代智慧。

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迈入到一个崭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世界性的大国,应该而且能够为世界和平贡献一份力量。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目的是为了世界和平事业的顺利展开,为的是增进全体人类的福祉,为的是推进人类文明的整体进程。根据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理论与孟子仁政理想有着多重的理论关联。孟子在与齐宣王讨论征讨燕国一事的过程中,对商汤平定天下一事进行了评价。孟子说:“《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

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上》）商汤正是因为举仁义之师，才得到天下人的期盼和拥护。这说明只有仁政的治理才能够得到人们的支持。压迫、欺凌、动乱、恐怖、贫穷、污染、腐败等等，都是与仁政王道相悖的。民之所望者不过仁道的治理。所有人都希望得到甘霖的滋润，都希望居住在稳定祥和的国度。如果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那就是大旱之望云霓。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人类社会期盼的云霓。2017年初，“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意味着人类已经确立了对命运共同体的自觉理念。当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和接受时，人类的大同时代就会到来。

注释：

- [1][9][17][20]赵岐注、孙奭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187、343、202页。
- [2]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页。
- [3]王夫之：《四书训义》（下卷），岳麓书社，1990年，第83—85页。
- [4]邓秉元：《孟子章句讲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页。
-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页。
- [6][1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89—290、357页。
- [7]习近平2016年1月16日在北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发言“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仪式上的致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1/16/c_1117796389.htm。
- [8][25]习近平2017年5月15日在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发言“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的闭幕辞”，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5/15/c_1120976534.htm。
- [10]何怀宏：《新纲常》，四川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页。
- [11][27]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03、23页。
- [12][13]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146页。
- [1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26页。
- [16]习近平2015年3月28日在海南省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博鳌亚洲论坛举行开幕式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5/03-28/7166267.shtml>。
- [18]焦循：《孟子正义》，中华书局，1987年，第859页。
- [19]习近平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言“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9/c_1116703645.htm。
- [21]王夫之：《四书训义》（下卷），岳麓书社，1990年，第311页。
- [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 [23]习近平2014年9月12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上发言“凝心聚力精诚协作 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再上新台阶”，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4-09/12/c_1112464703.htm。
- [24]习近平2015年4月22日在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上发言“弘扬万隆精神 推进合作共赢”，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4/22/c_1115057390.htm。
- [2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弁言”第3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